

武昌縣文史資料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武昌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武昌县文史资料

第六辑

(建国后史料专辑之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武昌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一九九二年十月

封面题字：陈义经



武昌县文史资料（第六辑）

编委会：沈惠东 何正益 金 锋 夏 康
程宝书 董光宇 韩宗旭

责任编辑：何正益 韩宗旭 董光宇

• 内部资料 •

目 录

武昌县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前前后后	张烈彩 (1)
我县杂交稻的应用与推广	祝匡时 (17)
我县柑桔栽培与发展	张芝林 兰天意 (25)
财贸部门支持发展柑桔生产的回顾	李慕涛 (29)
金口电排站兴建经过	王承林 何同勇 (32)
我县农业机械的发展与经营形式的演变	王所慈 (36)
我县供销社创建四十年	陈宗祥 (43)
回忆我县推行农商经济合同制	余明泉 (51)
蓬勃发展的武昌邮电	戈向东 (56)
欣欣向荣的武昌县铸造厂	董明禹 (59)
纸坊二十二万伏输变电工程建设始末	李学璋 (63)
开拓前进的武昌县纸坊蛋厂	宋健鑫 (76)
武昌县外贸良种猪场	刘锡祥 (81)
邢远长中学的创办与教育改革的尝试	刘庆江 (85)
武昌县职业中学	江开先 (89)
纸坊一小电教工作“三步曲”	涂宏国 (96)
在曲折中发展的山坡中学	李世祥 (101)
修建县师范校舍的回忆	程宝书 (105)
我县的勤工俭学活动	涂运江 (109)
武昌县老年大学的创办与发展	黄显金 (116)
忆县直机关干部业余文化学校	孙俊民 (122)
复查和纠正冤假错案的回忆	何正益 (124)

解放初期第七区剿匪的回忆·····	周锡光	(131)
“三教玄门”坛主黄太宗·····	雷敬兴	(134)
我县中医院的兴建与发展·····	郑玉刚	(137)
并不神秘的03医院·····	李红安	(141)
全国劳动模范汤万贵·····	项能恢 朱继芳	(145)
悼念艾先春同志·····	杨家堤	(151)
舍身抢救国际列车的邢远长烈士·····	童维军	(155)
我县当代农民画家罗建国·····	张国湘	(159)
昔日荒山秃岭 今天森林公医·····	金 锋	(166)
明昭王墓发掘经过·····	杨锦新	(170)
豹澥万年台史话·····	项能恢 吴国清	(173)
武昌县古桥略述·····	杨锦新	(177)

武昌县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 前前后后

张 烈 彩

我从1978年5月至1981年4月在武昌县工作，虽然一直担任县委分管农业的副书记，但有近两年时间实际上主持县委全面领导工作，后又兼任县人大常委会主任一年。我在武昌县工作的三年间，正经历了我国农村第一步改革的大潮，我同县委及全县干部群众一道，完成了伟大的历史转折的任务。从试点到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使农村开始走上告别饥饿和贫穷的路子；推行了耕作制度的改革，实行科学种田，推动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因地制宜地调整了农业内部结构，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建立农业企业，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全面发展。流光飞逝，10年宛如弹指一挥间。追昔抚今，略述数笔，其中或可供今天改革之借鉴。

（一）

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是生产关系的一场伟大变革，同时，也是人们思想上的一场革命。它不仅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而且把人们的思想从左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事实证明这场改革是十分正确的。

1978年5月到武昌县上班后，我一头扎进了农村，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把各乡镇都跑了一遍。既看到武昌县山好、水好、地肥、物丰，自然条件良好；同时，也看到了陋屋、破囊、缺

粮，农民生活十分贫困，特别是一些偏远乡村，上十岁的小孩都光着身子。我思索这里的群众捧着“金饭碗”为什么还要讨饭吃呢？为了追根究底，我白天在田头地边找干部社员拉家常，晚上围着煤油灯开座谈会，听取大家的意见和反映，共同分析生产搞不上去的原因。群众用通俗朴实的语言，表达了他们的想法，有的说：“公社干部拎个包，大队干部叉个腰，小队干部背个锹。”把症结归于干部作风；有的说：“男的是个爹，干不干都是那些；女的是个惹，含着饭往外跑。”把症结归于男女同工不同酬；有的说：“上工听敲钟，出工一窝蜂，做事磨洋工，记的大寨工。”把症归结于劳动管理；有的说：“从春干到冬，一天赚包大鸡公（烟）。”把症结归于劳动价值低。当议论到怎样才能把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时，不少干部社员说：“只有把老‘牛’（刘）牵出来，才能搞得好的。”从调查中了解到，有些生产搞得好的队，农闲记“大寨工”，农忙抓“锄”、“甩砣子”，对生产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当时，对于这种作法上面都持批判的态度，而推行的是农业学大寨，由生产队核算变为大队核算。牵老“牛”的事谁也不敢公开触及。经过反复调查，我觉得农业政策的确存在一些问题，为什么不能改一改呢？

正当我们在苦苦思索的时候，全国开展的真理标准讨论，给了我们一个认识和检验真理的“尚方宝剑”，使得头脑开阔起来。1978年6月22日，全县开展社镇对手赛大检查，我参加湖泗片的检查，当时在湖泗蹲点的革委会副主任程万高和党委负责同志汇报了何堰五队分为4个组实行分组作业，联系产量计酬；大灾之年农业增产增收的情况，认为这种作法有可取之处。但有的公社党委对此有疑虑，认为这是一个“新板眼”，好是好，但风险大，拿不准，主张等一步再说。我听了他们的汇报后，充分肯定了何堰五队的作法，鼓励他们试验下去。接着我又亲自到这个队调查，发现实际情况比汇报的还要好。这个队是一个50户的生产队，由于搞大派工，吃大锅饭，造成了4年减产，3年吃返销。为

了扭转这种状况，春上队委会冒着风险，自发地划成4个生产小组，联系产量和队里结算报酬，调动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在我调查时，他们到手的粮食增加近2成，油菜增产1.25倍，总收入增加2成以上。当时，我把他们的经验归纳为：“四固定”、“五统一”、“三包”、“两奖赔”分组作业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充分肯定他们既发挥了集体统的优势，又发挥了分的多个积极性，完全符合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随后，我又召集县委工作组和公社党委同志一起研究，取得一致意见。于是布置公社党委分别在邬桥六队、官堤一队、大屋堰五队等三种不同类型的6个队搞试点。同时，我又打电话给县委办公室派人来总结何堰五队的经验。材料写好后，立即印成简报下发全县，具体介绍这个队的作法。接着，在全县秋播会上推广了何堰五队的经验，这在鸽子山以南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得到了推广和发展。除湖泗6个队外，还有乌龙泉的新农村六队、山坡光星一队等，全县共搞了60个队的试点。

秋播会议后，我在全县调查了一批先进的生产队，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他们较好地实行了生产责任制，解决了“生产上一刀切、劳动上一窝蜂、分配上一拉平”的问题，调动了社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10月底，我调查了湖泗公社官堤州一队，感觉到生产责任制的威力是不可估量的。这个队农、工、副生产全面实行了责任制，大田作物联产到组，养猪、养鱼、养鸭、种西瓜、烧砖、蓄电瓶修理等生产项目任务到劳，同社员签订了三定（人员、纯利、奖赔）合同。实质上就是后来所说的专业承包。一年下来，结果粮食增产4成，人平3千斤，户平一万斤；油菜增产4成半；牲猪增长6成，达到人平1头；鲜鱼增长6倍。农工副产值翻了一番。11月13日，在全县公社书记水利会上，我大力推广他们的经验。我对公社书记说：“官堤一队，他们不怕说是工分挂帅，不怕说是关、卡、压，可以说是学大寨最好的。如果我们都象官堤一样，武昌县将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当然，到

会的同志并不难回答这个问题，难回答的倒是官提的作法行吗？

1978年12月，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会议作出了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决策和提出了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指导思想。会议制定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议》、《农村人民公社条例》两个文件，提出了包括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等具体措施，冲破了长期左的思想的堤坝，唤醒了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揭开了武昌县农村体制改革的序幕。

为了贯彻好这次会议精神，1979年元月11日，我在五里界公社召开了有公社书记、大队、小队干部和贫下中农代表参加的学习讨论两个文件的座谈会，听取基层的意见和反映。2月8日，县委召开了三级干部会议，传达了三中全会精神和发展农业的两个文件。会议较好地总结了左的弊端。通过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全县较好地解决了管理体制问题，恢复了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对大队核算的90多个队，全部恢复了生产队核算，解决了穿过渡和穷富“一拉平”的问题；充分尊重生产队自主权，调整农业内部的布局，因地制宜调整了粮食与经济作物比例；落实了社员自留地三万多亩，确定社员房前屋后树木的权属；加强定额管理，落实了生产责任制。

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中央对农业生产责任制开的口子还停留在集中统一上，并规定了两个“不准”（不准包产到户，不准分田单干），使生产责任制发展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我们还是大胆进行了尝试。5月份，推广了舒安、保福公社少数队搞单项作物、多种经营和工副业生产包到户、包到劳、联系产量计酬的办法，取得较好的效果。如王通五队油菜包产到户，一季增产三倍多；何堰五队苧麻承包到户，产量翻两番。全县60个搞分组作业、联产计酬的生产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形势。如潮泗6个生产队实行分组作业、联产计酬，一年实际结果，平均每个队增产的绝对数比全公社增产的平均数多三倍多。粮食1年增产等于

其它队3年，总收入增长等于其它队4年。铁的事实批驳了当时少数人对责任制的非议，也坚定了我们搞好责任制的信念。

从1979年秋播到1980年5月以前，是生产责任制发展的第二个重要时期。由于中央两个文件中提出的三种形式中有“分组作业、联产计酬、实行超产奖励”的一种形式，加之我们在1978年秋以来的推广，经过一年实践取得了显著效果，同时，市农办也推广了王通二队油菜包产到户的经验，于是我们大张旗鼓地推广湖泗6个队和王通二队的经验，在几次会议上，旗帜鲜明地号召全县向他们学习，并明确提出，大田作物实行分组作业、联产计酬，小宗单项作物包产到户，工副业和多种经营可以搞“五定一奖赔”（定劳力、定面积、定产量（产值）、定投资、定报酬、超奖欠赔）责任制和农机单机核算等。所以，全县干部群众对推行责任制的思想基础更牢了，积极性更高了。这样从1979年秋播开始，全县各种形式责任制普遍地发展起来。据当时统计，全县分组作业联产计酬由1978年底的60个队发展到470个队，占全县生产队总数的14%；油菜包产到户到组的有640个队，占种油菜3073个队的21%；棉花实行责任到人到组，联产计酬的有403个队，占集体产棉的527个队的76.5%；集体养猪实行联产的有900个队，占集体办猪场的1438个队的62.6%；养鱼实行联产计酬的有1208个队，占养鱼的3045个队的39.6%；还有养鸡、种瓜、工副业和农业动力机械也分别实行了“几定几奖赔”（定机手、定任务、定台时、定费用、定油耗、超奖欠赔）的责任制。

由于生产责任制的实行，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一时间，人们看到了财富一起从地下冒出来，原来的土地也会发生魔术般的奇迹。1979年，武昌县粮食总产达到5.7亿，比上年增产0.72亿斤，相当于7年的增产总和，第一次实现了超历史、超规划、超纲要。其它各业都比上年大幅度增长。油料增长62%，牲猪增加71.5%，鲜鱼增加31%。农副业总收入增长27.2%，集体提留积累增加70%，社员分配增长40%。全县农村出现了多年未见的

欣欣向荣的兴旺景象。这真是一言兴邦，一策惠民，生产责任制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

1980年4月至秋播前，是生产责任制发展的第三阶段。这段时间，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出现了。广大干部群众看到了实行部分责任制带来的好处，要求分的迫切愿望与当时的政策相矛盾；实行联产到组的作法，解决了“大锅饭”，又出现了“小锅饭”；小宗作物实行包产到户，社员投肥投劳积极性都放在小宗作物和自留地上，对大田作物不想下劲。这些对生产的发展带来很大的阻碍。此时，中央对“两不准”虽然未明令取消，但印发了陕西孟家坪生产队包产到户的材料，同时，小平同志提出了使农村尽快富起来的问题。这就为我们解决以上矛盾继续推行生产责任制打了气、撑了腰。当时，武昌县在大力推行小组联产计酬的同时，出现了一些包产到户队（当时叫大田作物联产到劳），致使一部分干部议论纷纷。有的说，“革命几十年，一下回到解放前”；有的说，“分田到了户，何必要干部”。面对这些思想，4月18日，我在全县农村经营管理工作会议上进行了分析讲解：“我们是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实行生产管理上的责任制，坚持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按劳分配、劳力的统一使用，还有统一抗灾等“五统一”，它是一种社会进步，而不是倒退。实践证明它有利于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我们的干部必须认识到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单靠行政命令领导生产是不行了，必须学经济管理，把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为了稳定大小队干部的思想，我们制定了《大小队干部“四定”岗位责任制》（草案）（即定人员、定任务、定补贴、定奖惩，把生产责任制与干部岗位责任制挂起钩来），印发各地讨论征求意见。5月30日更名为《农村工作干部奖惩办法》以县委文件正式下发，从而调动了广大农村干部的积极性，保证了生产责任制的顺利推行。

在双抢开始的时候，我推广了五里界公社联合8队实行大田

水稻“五统三分”（即统一育秧、耕整、投肥、打药、抗灾管水和分户栽种、分户管理、分户收割）责任到劳、联产计酬的经验，推动了各种生产责任制的发展，这对促进双抢进度，抢住季节，保证灾年夺取晚稻丰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面对责任制迅猛发展的形势，有的同志提出责难，要制止其发展。为此，我深入到锦秀大队点上进行调查，召开座谈会，并将情况综合后，于7月24日给县委写了一封信，特别指出：要解决责任制方面的一切矛盾和传说，一定要稳住责任制，稳定情绪，达到生产发展的平衡。这封信发出后，对统一大家的认识，保证责任制健康发展起到很好作用。双抢结束后，8月8日，召开了公社书记会。会上印发了土地堂青山2队“因田定产，包产到户”、乌龙泉致富14队“分户生产，包干到户”、潮洒王通2队“大宗作物定额包工、小宗作物联产计酬”、锦秀1队“专业化生产合同制”等9个典型材料。通过这些典型教育大家，引导大家自觉认识责任制的威力。如土地堂青山2队过去穷得出了名，人平口粮460余斤，人平分配不足80元。民谣说：“好女莫嫁青山咀，又怕干来又怕水。白天不见钱，晚上不见鬼”。1979年实行包产到户后，年底分配比上年翻了一番。群众说：“过去大呼隆，队穷人穷志也穷；现在承包田和地，队富民富两满意”。是好是坏农民最讲实惠。这九个典型推广后，各地纷纷仿效，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和专业承包三种形式的责任制遍地开花，发展更猛。

1980年9月至年底，是责任制发展的第四个阶段。9月初，省委召开扩大会议，重提了“两个不准”，县委决定召开三级干部会全面地贯彻。会前（9月7日），县委常委召开了专门会议研究部署，分析干部思想状况，一致认为社会上存在着一种纠偏思想。有的同志说：“当前主要是坚持平均主义与反对平均主义的斗争”。也有的同志说：“现在有四种人：一搞、二试、三看、四反对”。还有的同志说：“到会的人思想明确的占四成，动摇观望的占四成，说右了反对的占二成”。我主持了会议，提出了

三级干部会要集中解决解放思想、跳出框框问题：“责任制是搞活了，还是搞乱了；是探索还是胡闹；是搞的社会主义还是搞的资本主义。到底是放还是箍，关键是转好弯子。责任制的认识问题解决了，调整结构，改革耕作制度，下面就会自己搞起来。”统一认识后，确定了土地堂公社等12个责任制搞得好的单位发言，于9月12日至16日召开了三级干部会。我在会上作了《关于解放思想，放宽政策，搞活经济的报告》。但是，上级领导在会上对搞责任制提出了几条意见：1、对人实行定额管理；2、大宗作物不能包到人；3、从学大寨框子解放出来要有一个边缘；4、反对分田单干，共产党员不能带头单干。会后，上级领导将10个公社党委书记留下来座谈，有个别书记列举了责任制的问题说：“社员打破头，耕田累死牛，拖拉机上了楼，田里水断流”。好象责任制一无是处，十恶不赦。上级领导说：“不要跟风跑，不要跟报纸、广播跑，不要受外界影响，大宗作物到户到劳的再改过来。”县委有的领导也在会上提出：“包干到户要收回来，包产到户签了合同要收回来，水田到户要收回来，要推行专业承包和田间管理责任到人”。这样一来，那些带头推行生产责任制的党委书记抬不起头来，有的准备回去收。为了解决这些思想认识问题，会后，我仍然签发了我起草的《关于解放思想，放宽政策，搞活经济的意见》，以县委49号文件下发。文件在提出“两不准”的同时，提出了“大包干”是生产队统一领导下的责任制，不要混淆了“两个不准”的界限，从而保护了推行责任制的同志。同时，我火急地赶到责任制搞得主动的公社，给他们做工作。如土地堂公社余明山书记，会后准备抓紧时间收回来，怕搞了几十年把党籍搞掉了。我就说服他改革是有风险的事，出了问题我首先承担责任，鼓励他把责任制搞下去。经过我多方面的工作和各公社党委的共同努力，稳定了责任制的局势，避免了又一次折腾。

1980年9月27日，中央发了《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

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这个通知指出：“都应从实际需要和实际情况出发，允许多种经济形式、各种劳动组织、各种计酬办法同时存在而不拘于一种模式，不搞一刀切”。这些精神给了广大干部和农民带来新的武器，各地要求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呼声越来越强烈。但是，仍有少数人思想没有转过弯来，制造着很多阻力。群众说：“上面放，下面望，中间有根顶门杠”。为了解决“中梗阻”，把中央精神贯彻下去，在总结经验基础上，10月25日以县委办12号文件印发了《农工副各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合同书》，把责任制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一定几年不变，较好地解决了群众怕变、干部怕乱的思想，促进了家庭联产计酬责任制的健康发展。从10月份至11月份，我花了近20天的时间，深入到各地认真总结联产责任制的经验，从理论高度进行说明。同时，还安排县委办公室的同志到各地调查总结，写出一批有价值的总结材料。1980年12月26日至29日，县委召开了全县三级干部会议，对实行联产计酬生产责任制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并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从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才算真正在武昌县扎了根。1980年底在全县的生产队中，联产到组的占18%；统一经营联产到劳的占44%；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占38%。这一年虽然遇到大旱，但有灾不见灾，取得了仅次于1979年的历史第二个大丰收。

1981年初至4月份，是生产责任制发展的第五个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完善、提高责任制，尊重群众对实行哪种责任制的选择。当时，群众最感兴趣的是包干到户这种形式。它的特点是：生产自主、利益直接，它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既不是分田到户，又不统一经营，而是一种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用群众通俗的话说：“抗灾靠集体，收入靠自己。保证国家的，交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二月份，省委办公厅、省委政策研究室来我县调查研究，在写给省委的报告中对我县实行的生产责任制予以充分肯定，为我们正了名，鼓了

气，促进了责任制的健康发展。春耕之前，全县大田作物实行联产到劳、包干到户的已发展到90%以上；多种经营、工副业和小宗作物普遍实行“四专一联”责任制（即专业队、专业组、专业户、专业劳、联产计酬）。至此，武昌县农村以家庭承包责任制为主体的双层经营管理体制建立起来了。

（二）

改革农业耕作制度，实行科学种田，是农村全方位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它不仅提高了农作物单位产量，增加了农民收入，而且保证了农村各项政策的顺利落实。1978年底以来，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针对武昌县“田多人少、广种薄收”的现状，我们提出了科学种田，主攻单产的指导思想。在推广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同时，我们大力抓了耕作制度的改革，推行科学种田改良作物品种、推广各项农业增产技术，有效地推动了农业的发展。

1978年秋播前，我在“南八乡”对夏粮生产作了全面调查，发现夏粮单产总在百把斤左右徘徊，主要原因就是生产技术落后，一直沿袭几千年的老办法：种麦不开沟，底肥用火炼，播麦挖坑丢，劣种年年收。针对这种状况，在秋播会上，我提出了“五改”措施：改浅沟宽厢为深沟窄厢，改“烧火粪”为沤制有机肥，改点播为条播，改深播为适度浅播。为了更好推行这些措施，我在蹲点的安山公社山巷大队办了100多亩的夏粮高产试验片，一律开了中腰围沟，整成窄厢，采取条播撒播，用沤制的农家肥和氮磷钾化肥施全层底肥，淘汰了“万年2号”老品种，从我原工作的随县和省农科部门引进了“鄂麦5号”、“2061”等一批良种。大播之前，我们召开了现场会，组织县及各乡镇领导到点上参观。会后，全县迅速行动起来，各级领导都办了一批样板片，收到了较好的效果。第二年春，山巷试验片的麦苗长势喜人，麦齐穗壮，夏收打下来，每亩单产达到600多斤，比原来增产

近一倍。通过几次生产检查，县乡干部都耳闻目睹，原来积极的同志更增强信心，原来反对的同志受到了教育和启发。1979年秋播，“五改”措施推行十分顺利，全县普遍开花。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在各地建立了夏粮良种生产基地，把引进与自育良种结合起来，逐步做到良种自给。实行生产责任制后，农民采用新技术的积极性空前高涨，有的农民拿出5斤或更多的麦子换一斤良种。推广夏粮增产新技术成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1979年春耕之前，我们进行了认真的规划，把农业生产的突破口选在水稻生产上，大力推广水稻增产技术。3月8日至9日，召开2天分管农业书记、农技站长会议，提出了早稻要积极推广温室秧，努力扩大尼龙秧，尽量减少露地秧。会后，我调查了几个公社，选择豹海公社作为育秧试验点，同公社几位领导一起在九龙大队办试点，搞了一批温室无土秧、杂交稻二段育秧、分秧、尼龙秧。为了做到稀播壮秧搞了几块摆播秧试验，大队技术员还自制了一个木制的摆播器，效果不错。3月17日，在豹海公社召开育秧现场会，各公社、委、办、局的一百多人参加会议，先组织大家看了育秧现场，然后，在公社大礼堂开会。会上，公社负责人介绍了经验，县农业局几名技术人员讲授早稻育秧的技术。我在会上指出：“我县农业生产水平低是低在科学种田水平上，要发展农业必须靠科技解决问题”。会后，全县保温秧面积迅速得到落实，达到134800亩，占早稻总面积的44%，为夺取早稻丰收打下了良好基础。1979年插晚稻之前，重点推广了晚稻的生产技术。我在五里界锦秀大队抓点，推广了种青养肥，播种了怪麻、红萍、水浮莲等绿肥，做到种地养地；同时，抓了晚稻的全层施肥和机耕、机整、机插一条龙耕作新技术。7月中旬，在这个大队召开了全县晚稻生产现场会，把这一套技术推广到了全县。通过推广新技术，1979年早稻单产516斤，晚稻单产457斤，全年粮食总产创历史最高记录。当时群众说：“吃的政策的饭，增的科技产”。

1980年我们狠抓了油料的生产技术。通过几年对武昌县油菜生产的深入了解，总结一条教训，就是老的生产方式阻碍了产量的大幅度提高。如广种薄收，点播直播等。为此，我首先从抓苗床入手，从扩大油菜下田着眼，在全县推广育苗移栽技术。同时，认真抓了几个样板，推广了锦秀一队、邬桥大队板田移栽油菜、光星大队水田、旱地育苗移栽的经验。冬春又抓了深沟抬田的技术推广。入春后，又抓了喷硼新技术。通过身体力行办样板，和召开现场会与下达指导性计划相结合的办法，油菜面积达到6.8万多亩，总产达71万多斤，单产104斤，做到“三超历史”（面积、单产、总产）。全县出现了人平贡献油籽20斤的公社一个、30斤的大队6个、50斤的生产队45个，在武昌县油菜生产历史上写下了新的一页。

从1979年以来，为什么各项技术能顺利推广，主要是狠抓了耕作制度的改革，一直坚持轮作换茬，保护地力、保护劳力，提高生产率的方针。扩大了夏粮夏油，适当压缩了绿肥、双季稻，改造冬泡田、冷浸垄，做到了小麦油菜下田，早稻绿肥上塝、上畈；水田实行油稻、麦稻、肥稻和油稻稻、肥稻稻轮作换茬，旱地实行了麦油、麦豆、麦杂轮作换茬。通过这一系列措施，使武昌县农业生产由传统方式，转到了依靠科技发展农业的轨道上来。

（三）

调整农业结构，发展多种经营，建立农业企业，是农村第一步改革的一个核心问题。它不仅能促使政策作用充分发挥，而且是致富农民，巩固集体经济的有效保证。1978年底以来，我们因地制宜地调整了农业结构，退田还湖，退耕还林（特产），兴办农业企业，发展乡镇企业，发展多种经营，走出了一条依靠集体共同致富、勤劳致富的新路子。

我1978年到任后，经过广泛调查，对县情形成两点看法：一